

福州乌山摩崖景观与宋明儒学的政治文化空间

魏玄览¹, 魏峰²

(1. 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画学院, 北京 100105;

2. 福建理工大学 设计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8)

摘要: 福州乌山的摩崖石刻既是当地标志性的人文景观, 也是宋明时期闽地儒士政治文化生活的物质记录。以文献梳理、铭文释读与情景分析的方法, 强调儒学群体与摩崖景观发生互动的具体历史语境, 从乌山摩崖景观的体验传统、景观建构的双重历史线索、摩崖景观的政治历史象征意义、乌山游赏的情感范式与文化意义这四个维度展开, 指出乌山摩崖景观是一个由历代士人依托儒学政治历史观和文化价值观所塑造的、以宋明儒学传统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空间。

关键词: 福州乌山; 摩崖景观; 宋明儒学; 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 J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3853(2024)02-0163-07

Wushan Mountain cliff inscription landscape in Fuzhou and political-cultural space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WEI Xuanlan¹, WEI Feng²

(1. School of Chinese Painting,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Beijing 100105, China;

2. School of Design,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Abstract: The cliff inscriptions in Wushan, Fuzhou are not only a landmark cultural landscape of the local area, but also a material record of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ife of Fujian Confucian scholars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By combining literature review, inscription interpretation, and situational analysis,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nfucian community and the inscription landscape, and explores the four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tradition of experience of the Wushan inscription landscape; the dual historical clues of landscape construction; the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inscription landscape; the emotional paradigm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Wushan tour.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Wushan inscription landscape is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pace centered around the Neo-Confucian tradition, shaped by scholars of various dynasties based on Confucian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views and cultural values.

Keywords: Wushan Mountain in Fuzhou; inscription landscape; Neo-Confucianism; political culture

乌山亦称乌石山、道山, 位于福州市中心南门兜西侧, 自唐代起即是闽地重要的名胜古迹。遍布山间的巨石古榕与二百余处历代摩崖石刻共同组成了乌山的标志性景观。^[1-2] 它存留了众多宋明道学硕儒与名臣将相的历史印记^[3], 也提供了

本文所聚焦的主题: 摩崖景观的建构与宋明时期闽地儒士政治文化活动直接关联。宋明儒学的政治关怀与学理内涵对传统名胜景观的渗透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命题, 以士人观者为主体的园林和书院景观, 被视为儒家政治立场与教化思想的物

收稿日期: 2023-10-10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FJ2022BF079);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22J01940)

第一作者简介: 魏玄览 (2000—), 男, 福建福州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画与中国传统文化。

通信作者: 魏峰 (1971—), 男, 福建福清人, 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 环境设计与建筑装饰艺术。

质文化空间,景观中的各式构景要素均被赋予了专属于理学的文化象征意义。^{[4]130}本文希望承接这一研究思路,关注儒学与景观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及其发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并从该研究视角出发,以清代福州本地学者编撰的文献《乌石山志》为主要文本依据,梳理宋明时期儒士游者游赏乌山的诗文材料与铭文题刻^[5],结合士人对乌山摩崖景观的体验传统和意义建构,探讨这种情感勾连如何在历史情景的变迁脉络中依托政治性和文化性的双重线索支撑,逐渐将乌山塑造为一个属于宋明儒者的政治文化空间。

一、乌山摩崖景观的体验传统

福州乌山的摩崖传统肇始于唐李阳冰篆书摩崖《般若台记》,此后历代硕儒名臣如程师孟、陈襄、李纲、潘正夫、朱熹、林廷玉、叶向高、薛梦雷等均曾留题以接续文脉,摩崖石刻因而成为乌山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文景观,寻访和品读摩崖石刻也成为后世文士游览乌山的惯例项目。此类活动在文人赏景传统中被纳入“读碑”的行为范式,它并非将景观预设为对象化的客体,而是以某种具体的行动将景观纳入流动性的情景中,塑造游者与景物互动的美学关系。“读碑”的文化活动根植于悠久的传统,由《世说新语》中“曹杨读碑”的轶事性记录开启,至宋代转为一种文人化的游赏活动。文人在读碑行为中凭吊往昔,回顾历史兴替的进程,深刻反思个体在历史中的位置。^[6]但是,与瞻仰丰碑的缅怀性的崇拜目光不同,宋明士人对乌山景观的体验与特殊的空间情境密不可分,因而围绕摩崖古迹的观赏活动也将以更具感受性和行动性的方式展开。

闽东沿海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与常绿阔叶林的植被类型塑造了乌山摩崖景观。这种自然意义上的独特视觉性,在宏观和微观的景观层面上发生作用,引导观者实现多维度的审美体验。需要提及的是,现代乌山的地理环境与宋明时期相比有极大的差异。如今的乌山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城区内,雨季较为闷热。而在历史上,由于闽江流域泥沙堆积尚未覆盖到如今的面积,乌山实则毗邻东海,位于江海交汇处,周围被复杂的水系所环绕,视野开阔,空气流通。因此,亚热带海洋性的气候条件为乌山景观提供了独特的视觉审美资源,风雨云雾等湿润的气象将硬性的山石景致渲

染为富有云山趣味的诗意空间,观者的观景活动多在这样的氛围中展开。如王佐《游乌石山》描绘了“一林淑景山如画,满地藤花路欲迷。风引磬声入寺近,雾连岩石觉天低”^{[5]16},韩锡《邻霄台吊周太朴》也有“斫怪石兮受楹,藉碧草兮为茵,卧古榕兮弹素琴,陟嵌岩兮弄烟”^{[5]25}的表述,这种充满感官体验的审美意境是宋明文士咏咏乌山的经典诗境。

除了宏观的气候环境,特殊的地质环境与植被类型也是塑造摩崖景观的核心要素。乌山上的历代摩崖石刻多依托于巨大的花岗岩,而岩石因风化作用形成的球状节理则为榕树根系的生长提供了空间,盘根错节的老榕根系与质朴浑厚的花岗岩为摩崖石刻搭建了厚重的舞台背景。在此,摩崖石刻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单体纪念碑,而是融于整体的巨石古榕环境的构景主角,如当时的霹雳岩景观组合:“霹雳岩,三十六奇之一。在清冷台左,楷书镌‘霹雳岩’见《石刻》三字。相传宋熙宁初,郡守程师孟笔也。岩下有老榕二株,垂须入地,拱立如门,近为大风所拔,一干无存。”^{[5]54}这一胜景在宋代已形成了独特的景观审美意趣。

从景观的微观层面来看,乌山摩崖景观最具风味之处来自于低矮的视线,它要求观者以直接的身体性接触来完成与古迹的美学交流。福州雨季的生态环境极有利于地衣、苔藓、蕨类及藤蔓植物的生长,它们附着于岩石的表面,掩映、遮蔽并侵蚀摩崖铭文,形成了古老而神秘的场景氛围,吸引观者对古迹进行超近距离的观察。宋代以后的儒士观者对这种独特的视觉接触也颇为兴趣,如曾仕鉴《游乌石山》有“高峰半挂城头树,积藓全封石上题”^{[5]17}的诗句,许鼎《道山亭怀古》也写过“断碣岁深苔自长,荒台日落鸟孤吟”^{[5]23}。这些岩石表面的植物生长暗示出历史变迁的痕迹,强化了摩崖石刻的“古物”性质,因而也成为文人诗作所青睐的意象。

为寻访摩崖石刻,游者必须亲身涉险,攀爬上巨石崖壁,亲手剥开覆盖于岩石上的苔藓,才能“重现”被遮蔽的古迹铭文。剔除自然植被以显现人文遗迹的过程,引导了一种切身的、亲密的、探索性的身体接触,消解了主体性凝视的可能,而这种体验性的行为过程正呼应了朱子学“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要求;即使在微观意义上的“读碑”活动中,物我互动的身体思维也应得到贯彻,景观被

作为是心智所见的自然,体察事物需要躬亲于事。^[4]^[142-179]这种自然主义的美学观念在一系列描摹行为动作的词藻中展露无遗,“拂拭”“扪”“剔”等动词成为文人题咏中的点睛之笔,如“荒苔时拂拭,得见旧题真”(张时彻《游乌石山》)^[5]^[16]、“为寻古迹扪萝石,更上高原看海潮”(陈朝铤《登乌石》)^[5]^[17]。而谢肇淛的《宿猿洞》诗则为身体与景观的互动体验链条提供了完整的诗意表述:“干旄动枉刺史驾,苔壁尽勒词人诗。苍苔满目空延眺,荒骨游鳞夜相照。一片孤城有乌啼,千年古洞无猿啸。我来剔藓辨遗文,正值春初山吐云。风流文采知何处,白杨萧萧那忍闻。”^[5]^[47]

由于植被与水土的生化侵蚀作用,摩崖石刻的字迹往往漫漶不清、难以辨识,但不清晰的视觉表面却带来了一种朦胧的历史距离感,易唤起游者追思往昔并兴发题咏。如谢汝韶《游乌石山》:“不到乌山二十年,重来景物倍凄然。翠微台榭皆新主,苍藓碑文只断篇。”^[5]^[18]再如喻应益《登乌石山》:“邻霄台倚白云平,日日看山不出城,礼塔已迷前代寺,摩岩半记古人名。几家占胜为园就,一径通幽傍石行。满目烟花非旧国,登临漫道客愁轻。”^[5]^[18]这些诗篇不但承接了魏晋以来读碑吊古的游赏传统,更传递了一种儒士游览乌山所共同的抒情范式,将物质性的摩崖石刻转化为乌山景观题咏的核心情感意象。

从宏观层面的整体氛围感受,到中观层面的树石景物组合,再到微观层面的寻访、发掘、品读古迹的身体性活动,宋明士人在诗文题咏中暗示了乌山摩崖景观所特有的审美传统和情感范式:它要求游者切时切身地进入、感知和体验这个立体丰富的美学空间,在与景观的审美互动中体悟理学“不离日用”的朴素原则。正是在历代儒士观者对景观的塑造和体验中,一套作为文化机制的特殊游赏传统被建构起来,石刻开始在物质文化的意义上被转化为士人情感文化交流的重要景观资源并积极地参与到宋明儒学政治文化空间的建构历史之中。

二、景观建构的双重历史线索

乌山摩崖石刻不仅是审美认知的对象,还是作为历史见证的纪念碑。宋明儒士依托感性体验所建构的游赏传统,将在更加理性化的历史陈述中获得合法性,并进一步丰富摩崖景观自身所承

载的象征意义。而围绕摩崖的物质性实存所衍生的文本,则是儒学对政治文化空间建构的核心素材,这一传统可追溯至北宋福州太守程师孟所书的《道山亭》小篆铭文。程太守因感乌山风景隽逸,堪比道教的蓬莱仙山,故起名“道山”,并筑道山亭以纪念盛景。程师孟治理福州的功绩见载于曾巩的《道山亭记》,在这篇散文的开篇,曾巩以古雅的笔风描写了闽地山高水急的艰险自然环境,不但证实了乌山地区的古地理环境,也与后文福州城内的物阜民丰构成了鲜明对比,进而夸赞太守治理地方的政绩及其高尚品格:“闽以险且远,故仕者常惮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乐,非独忘其远且险,又将抗其思于埃壙之外,其志壮哉。程公于是州以治行闻,既新其城,又新其学,而其余功又及于此。”^[7]

曾文秉持“因事而发”的主旨^[8],将程师孟树立为儒家官员的榜样,其评判根据有两层含义:政治上治城有方、泽及细民的才干与思想上不畏艰险、志存高远的胸怀。显然,古文运动与熙宁变法构成了《道山亭记》的双重政治文化背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初儒学在政治上强调经世致用的“外王”领域,其基本命题则是为政治和道德寻找一元的思想基础,试图为历史寻求一个完善的道德秩序^[9],这为曾巩将程太守的地方治理功绩与其高迈品格的并置提供了解释。紧随政治上“新其城”之后,曾巩进一步强调了文化上的“新其学”,此处“外王”与“内圣”的并重则显示出王安石“新学”转向的影响。曾文所展示的儒士胸怀可镶嵌于北宋儒学的发展脉络中,宋初古文运动与熙宁新学都以重建合理的人间秩序为主线,尽管二者就“内圣”领域的定位存在分歧^[10],但是政治意义上的“外王”与文化层面上的“内圣”必须相互支援的原则并无根本改变,只有内外兼修才能继承三代事业,实现“推明治道”的儒学政治理想。

在物质文化的层面上,程师孟所遗留的题刻正是北宋儒学政治文化的标志性景观。小篆书体端庄质朴的风格象征着福州地方治理所映射出的理学政治构想的崇高精神。每一个后儒游者在观看这方纪念碑时,都必然联想起曾巩的散文及其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视觉、阅读与思想以物质性的形式相互交织,这是儒家学者对摩崖景观塑造的重要途径,也正是借助于围绕物质形式的文

本的支撑,乌山在此之后即被宋明儒学赋予了明确的双重情景脉络:“外王”的政治领域以朝代的治乱兴衰为线索,“内圣”的文化领域以道学薪传为线索。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奠定了后学对乌山的基本情感范式,逐渐建构起一个多层次的、感性的政治文化空间。

三、摩崖景观作为儒家政治历史观的象征

儒家文化始终保持着山川与天下的紧密联系,如“国破山河在”指明了朝代更替而山川永存的历史感。这种自然实存与人间秩序的比赋关系,在乌山景观的政治寓意空间的建构中起到了根本上的象征性作用。宋明时期的石刻铭文内容绍续了程师孟与曾巩为乌山所奠基的儒家政治传统,将景观转化为指涉人世间兴盛苦难、从“乱世”到“治世”的政治象征。明儒杨应诏的《游乌石山记》直观地阐述了这一传统,同样是依托自然景观的“三山之奇”与国朝治乱的“三山之苦”的强烈对比,将“模糊可见”的摩崖石刻视为对乱世苦难的深情见证:“吁!子知吾三山之奇,而不知吾三山之苦。余老于此者,緬昔兵兴以来,自萧梁迄唐、宋、元、五代中,巢贼、王、陈父子割据纷纷,余不暇枚举。即曩者正德己卯进贵兵乱,寻己未倭夷犯海上,来寇吾城,此山岩穴石孔间,稜稜皆兵甲猬立,宫宇殄于回禄,所遗者不过数拳荒石,狐丘鸟道,独在目中。子视今之势,将来者又何如前?小石嶂上不知何代,纪兵变寇乱语,石刻犹模糊可见。”^{[5]14}

文中所提到的记载兵变寇乱的石刻可与现存的潘正夫摩崖相互印证,这方摩崖记载了靖康之难中南逃的吴国长公主的行踪:“靖康之间,金人犯阙,二圣北迁。逮建炎中兴,天子受命吴国长公主始至睢阳。明年寇淮甸,遂浮江而南避于钱塘。车驾,幸建康还,复入觐,继适江表,会胡骑奄至,循赣水走湘湖、濒南海而达闽川,馆于福唐之神光,因登乌石山,观李阳冰篆,乃得古人之遗意……”详见图 1。由图 1 可知,即使在金人追击的紧要关头,南逃的公主仍不忘拜谒乌山的李阳冰摩崖。福州作为这批流亡的宋朝宗室的最后避难所,承载着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与情感共鸣,世事的苦难得以在摩崖石刻上得到倾诉和纾解。

国家的治乱兴替始终是乌山摩崖所承载的基本内容,直到清代,儒士萧震在《仰止亭论》中仍

通过朱熹在乌山的讲学活动,反思道学群体的朋党之辩与两宋亡国的原因。^{[5]33-34}在儒学的历史观与政治观中,国家兴衰与天下的“有道”和“无道”存在直接联系,天下治乱的历史即处于“得道”与“失道”循环往替的进程,正如孟子所谓“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11]。而与人事节律性的历史变动形成对照的是岿然不动的山川,它在儒家的政治文化结构中扮演着天下治乱的终极见证者和感应者的角色。闽地曾有讹言“乌石青,起刀兵”,即从另一角度证明了乌山景观面貌与国朝兴衰紧密关联的象征寓意。

从儒家的施政理想而言,由乱世到治世所需要的不仅是儒学家在“道体”层面履行“致君行道”的理想政治秩序,还需忠勇之士在秩序实施环节完成作为第一要义的“平天下”事业,这种恳切的诉求也正以摩崖景观的方式来呈现。嘉靖年间,倭寇进犯闽地,烧杀抢掠,明将黎鹏举率军镇守乌山,历经血战击退倭寇,保卫闽地一郡平安。百姓敬仰黎鹏举忠勇无双,即在幞头石上刻铭“乌石在,黎公在”,见图 2,即为黎公崖。这段典故所承载的历史诉求成为了名儒陈衍的《黎公崖记》的情感主旨:“微将军,其如吾之父母何,其如吾之妻孥何,海枯石烂,惟将军寿无疆。乌石,郡之护山也,嵯峨磊落,与将军名俱永矣。故铭而勒之。”^{[5]59}乌山之巍峨与名将之忠勇构成了相互映照的历史形象,二者的联系通过摩崖石刻而获得永恒的物质担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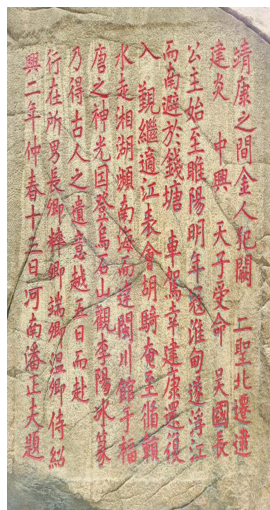


图 1 [宋]潘正夫摩崖
Fig.1 Inscriptions by
Pan Zhengfu in the
Song Dynasty



图 2 [明]黎公崖摩崖
Fig.2 Inscriptions of Li
Pengju in the
Ming Dynasty

在黎公的故事中,摩崖景观将乌山转化为一个由苦难走向兴盛的纪念碑;而在明代福州经济的昌盛时期,乌山又被塑造为另一类型的政治空间,它指示着儒士群体推明治道、泽被地方的政治理想。乌山北麓的常丰仓为洪钟撰写《福州府常丰仓新建却金廨记》提供了素材,文章开头写道:“经国安民之道在忧其有备而已。夫有其备而后可以济其事,先其忧而后可以享其乐……所以必先忧其有备,而后可以乐其有济也。”^{[5]63}洪钟所提出的治国安民的履行原则,也延续了范仲淹“天下忧乐”之辩的主题,力图为一郡百姓谋得富裕。正是在这一系列围绕乌山与摩崖的历史文本中,乌山的摩崖景观成为了儒学思想逐层累积的物质表征,乌山也被塑造为国朝兴衰的亲历者与地方行道的文明标志,见证了闽地由乱世到治世的历史进程。宋明儒学将治乱循环的历史观与“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外王”理想注入了作为政治空间的景观,这是乌山自北宋以来所生成的独特的儒学基因。

四、乌山游赏的情感范式与道学薪传的文化空间

由于乌山摩崖石刻总是承载着朝代更迭的深厚历史记忆,儒士游者因登临吊故而引发的世事变迁感叹也逐渐形成了一种集体性的情感范式。通过一代代宋明儒士的铭文创作与文本堆叠,乌山景观逐渐拥有了一套成熟的游赏体系,包括意象选择、行为引导与情感表述三个层面。首先,与摩崖景观相关的一系列构景元素得到了确定,包括气候、植被、岩体、书法和铭文等,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抒情性诗文的意象基础。其次,游览乌山的行为也获得了一种序列性传统,儒士通过登临、攀援、读碑、静坐、远望等行动,历时性地表达观者主体与景观的互动关系。最终,在山水与人世的基本比赋关系中,一种有迹可循的观看逻辑和情感范式被建构出来:登临乌山必观赏摩崖石刻,观看摩崖意味着反思历史,对往昔的回顾则转化为时过境迁的慨叹,由此引发时光流逝、人生渺茫的“川上之叹”,唤起游者对传统儒学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思考。这种游观叙事脉络连接了自然、历史与个体存在者,建构起了含义丰富的情感化的时空网络,这也在元人李世安的摩崖石刻上完成了

最精彩的物质显现。李世安摩崖石刻,苍茫雄浑的颜体大楷字与巨石古榕、幽苔藤蔓交相辉映,景观与文字的感性联结共同传递了动人肺腑的情感力量:

至正壬辰冬,余以柏府之命如广海,经三山,止神光寺。明年正月朔,寇逼郡城。是日,与廉使许希文共守南门,董督备御,越二十六日,建、邵分宪金事郭继先率援兵南下,贼遂败溃宵遁。迨秋,余自广回,复假禅榻之寓者弥月,凡山川之形胜,民物之殷庶,无不在心目间也。噫,人生等浮沤,世事如转蓬,是以登兹山而增慨,抚故实而兴嗟。后之纪斯游者,亦必览是而有感焉……

这是一篇“标准的”石刻铭文,它代表了宋明士人登临游览的典型的审美体验范式:乱世兵燹与民物殷庶的历史演替给登临者带来了无限的苍凉之感,以至“登兹山而增慨,抚故实而兴嗟”。

李世安在题刻正文的结尾向后世游者抛出了共情的诉求,这也得到了闽中名士谢肇淛的深情回应:“北面刻‘钱仲谟’及‘功德院’二绝句,皆程笔也,字势飞动,刻手精工,先辈文采风流,宛然如见。自熙宁至今不五百载,而洞壑形胜,零落殆尽,乃今养高泚瀚之场,鞠为荒丘丛冢之所,沧桑变易亦可伤也。余以壬子正月四日,拉徐兴公、陈永奉、吴元化及季弟肇道髡髻裊榔间,摩挲藤藓,踞坐竟日,吊地下之高踪,悲胜事之不复,盖流赏之欢少而陈迹之感多矣。”^[12]在这篇《游宿猿洞记》中,谢肇淛同样遵循了乌山摩崖石刻的体验传统,在与古迹勒铭、巨石深洞和枯藤苔藓的亲身体验中,触动了沧桑易变、胜时不再的感伤之情,这是摩崖景观为儒士游者所共享的流动性的情感资源,也是作为登临吊古的文化空间的乌山所特有的情绪共鸣机制。

但是,以人世为中心的宋明儒学绝不止步于此,怀古伤今不会导向历史虚无主义,闽中儒士恰恰在这种饱含人文关怀的情感脉络中寻找到了自我的历史位置。明代的儒士观者绍续了北宋曾巩为乌山所奠定的另一条历史脉络,即理学家“内圣”面向的文化传统。在由乌山摩崖景观所塑造的儒学文化空间中,道学薪传的文脉并不会因历史的变迁而消失,而历代名儒的摩崖石刻也在这个语境下被转化为理学渊源的物质象征。作为闽

地儒学的精神场所,乌山脚下的道南祠即是儒学传道的最佳证据。嘉靖年间的儒士马森在《道南祠碑记》中明确梳理了两宋道学的传承线索:闽地儒学由宋儒龟山先生杨时开宗立派,故谢肇淛以“上继先正一贯之统,下开后学千载之传”^{[5]108}为其在学脉中定位。杨学是程颢洛学传派,可上溯至周敦颐的道学传统,而杨时以后的“闽学”依次由罗从彦、李侗、朱熹所承续,四人并称“四贤”。直到明代,以闽学为宗的书院和供奉道学名流的祠庙仍在乌山周围广泛分布。道南祠为进一步宣扬闽学,将所供奉程、杨、罗、李、朱并称“五先生”,使理学的学理精神更深刻地印入福州的乡土文化基因。如马森所言:“噫,自不著不察,日用不知,道在天地间,固互古今未息也。孔子川上之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程子曰:‘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义’,则于斯道之绝续也,亦在夫学者于此焉辨之,以默识夫五先生之言,而得乎录者之意而已矣,谨僭为之记,而因以告吾党焉。”^{[5]107}正是在宋明儒学薪火相传的历史脉络中,登临乌山怀念古迹的慨叹得以慰藉,乌山游赏的情感机制到此才获得了最终的完善。

宋明理学所主张的人间秩序接续了深厚的古典儒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印证了发源自上古神圣的“道统”需由“道学”来接续。朱熹所主张“理一分殊”之道作为天地秩序的最高构成性原则,在性理意义上即指宇宙本体的太极与万物之性的关系,万物的差异表现均存在普遍原理的统一性,而人的认识即需根据这一原则,在对事物体察的反复积累中穷究贯通天地万物之理,^[13]因而“道在天地间”的意义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均实现了超越物理时间范畴的“古今未息”。宋明理学正是以修齐治平的内在实践性原则对抗潜在的历史虚无主义,在如江水一般的流动性中生成绵延不断的文化意义。

乌山摩崖是承载着深厚儒学渊源的景观实体,它的精神以朱熹的榜书题刻最有代表性,见图3。字径丈余的擘窠丰碑以雄浑苍茫的书法意境冲淡了缅怀古今的浪漫忧思,代之以磐石般坚实的“永恒”概念^[14],成为了景观空间视觉文化和物质文化最震撼的纪念碑,将象征着理学生生不息的崇高力量传诸万世。直到清代福州学人回顾编纂乌山的诗文史料时,“当年名迹蒙苔藓,愁

读荒台石上文”^{[5]31}的游览观赏范式仍延续着宋代以来的儒学审美传统与情感逻辑。摩崖景观既代表着宋明儒士政治文化活动的身体性的物质表征,又是儒学空间所赖以维持的精神资源,它以无尽的生命力对抗山河兴衰的苦难与时间消逝的虚无。在此语境中,正是宋明儒学的薪火相传支撑了乌山作为政治文化空间的终极意义。



图3 [宋]朱熹“福”字摩崖

Fig.3 In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 Fu by Zhu Xi in the Song Dynasty

五、结束语

本文注重景观与文献的相互印证,结合乌山景观的客观环境梳理《乌石山志》中散落的宋明诗文材料,在不脱离宋明儒学政治文化具体历史背景的前提下进行讨论。通过梳理福州乌山摩崖石刻景观的独特游赏传统与曾巩《道山亭记》所奠定的双重历史线索,从政治兴衰进程和情感文化维度展开宋明儒学对乌山及其摩崖景观的塑造和体验,指出儒学传统在建立一个充满情感流动的政治文化空间时所发挥的本体性作用。有学者认为,由于缺乏宗教的支持,明清时期是中国风景名胜开发的“守成阶段”^[15],但福州乌山景观的建构则证明了儒学对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的重视与开发。宋明以来的乌山是一个属于儒士的政治文化空间,它所秉承的是宋明儒学“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关怀与中国文化“以事载道”的传统。“道”与“事”在经验的和感受的景观空间中达成了互构性和一体性^[16],并以充满情感的历史叙事完成了对时间无限性的内在包容,而乌山的摩崖景观正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精神的绝佳证明。

参考文献:

[1] 陈为. 明清时期福州三山风景体系研究[D]. 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20.

[2] 林继卿,陈新艳. 微观视域的福州乌山摩崖石刻景观分析[J]. 安徽建筑大学学报,2021,29(3):92-97.

[3] 张春兰. 福州乌山宋代摩崖石刻及相关历史问题研究[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1.

[4] 柯律格,包华石,汪悦进,等. 山水之境:中国文化中的风景园林[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5] 乌石山志[M]. 郭柏苍,刘永松,纂辑. 黄宗彝,郭柏芎,参订.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 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

[6] STURMAN P C. The Donkey Rider as Icon:Li Cheng and Early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J].Artibus Asiae,Vol.55,No. 1/2,1995:86.

[7] 曾巩. 元丰类稿五十卷:卷十九[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11.

[8] 陈笑笑. 曾巩散文与儒学[D]. 扬州:扬州大学,2016.

[9] 包弼德. 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M]. 刘宁,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247-250.

[10] 余英时.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39-40.

[11] 纪晓岚等. 四库全书精华:经部[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202.

[12] 谢肇淛. 小草斋集[M]. 汪中柱,点校.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199.

[13] 陈来. 宋明理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209.

[14] 巫鸿.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M]. 李清泉,郑岩,等.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55.

[15] 周维权. 中国名山风景区[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63.

[16] 赵汀阳. 历史·山水·渔樵[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5.

(责任编辑:王圆圆)

(上接第 107 页)

“四个重大转变”谱写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的理论遵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继续挖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座理论富矿,以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继续把握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变化,不断强化美丽中国建设的自主性,进而共同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N]. 人民日报,2023-07-19(1).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N]. 人民日报,2022-10-26(1).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452.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75.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7.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7]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0-471.

(责任编辑:王圆圆)